

景遐东◎主编

中外文史 经典导读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为湖北省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湖北省高校重点学科、湖北师范大学“双一流”学科资助项目

中外文史经典导读

景遐东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史经典导读 / 景遐东主编. --北京 : 人民

日报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15-2379-2

I. ①中… II. ①景…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欣赏—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888 号

书 名: 中外文史经典导读

主 编: 景遐东

出 版 人: 董 伟

策 划: 庞 强 高 栋

责任编辑: 孙 祺

封面设计: 宋晓璐·贝壳学术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雅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36 千字

印 张: 23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379-2

定 价: 92.00 元

《中外文史经典导读》编委会

主 编 景遐东

副 主 编 彭江浩 王 成

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芝兰	王 成	王再兴	王守雪
车录彬	文彬彬	石 麟	刘桂华
李有光	李治平	杨文军	吴福秀
张道俊	赵爱武	胡淑芳	贺义廉
晏 亮	徐伯青	黄 芳	黄燕妮
彭江浩	景遐东	舒大清	曾羽霞
谢龙新			

序

湖北师大文学院前身之中文系建于1973年，乃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分设，当时只有汉语言文学一个专业，1978年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专业。长期以来，文学院坚持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坚持本科教学中心地位，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学科与专业建设为龙头，以特色科研为动力，充分发挥师范特色和优势，注重内涵建设和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汉语言文学2007年获批湖北省高校品牌专业，2008年获批教育部特色专业立项建设点。2000年后，中文系陆续设立了广播电视学、汉语国际教育和广告学三个新专业，2008年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学院。学科建设上，1986年开始与湖北大学联合培养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6年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二级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年语言学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获批湖北省重点学科，并获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审美文化与文学七个二级方向培养研究生。另有语文课程教学论学术硕士点和学科语文（专硕）点。文艺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湖北省“楚天学者”设岗学科。全院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1200余人。

文学院现有教授20人（含3名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副教授18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36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学缘优良，梯队明显。文学院学术研究形成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叙事学、地域文化与文学、湖北方言、模糊语言学等许多领域全省领先，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四十余年来，文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基础教育优秀师资和地方传媒从业人员，为国家基础教育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目前，文学院正瞄准“双一流”目标，围绕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中部崛起计划，致力于转型与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加快学科内涵建设，争取早日建成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进一步扩大本学科在全省、全国的影响力。古语云“惟楚有才”，楚文化具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文学院“厚德、博学、明辨、笃行”的理念和踏实勤奋、顽强拼搏的精神，

激励着文学院师生不断砥砺前行!

经典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根基,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走向未来的起点。经典包括中国的、传统的和世界的三个维度,所谓古今中外。经典又是历经岁月淘洗、汇聚古今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精华。大学具有突出的系统性、理论性与研究性,中国语言文学是大学的基础学科,又是化育人的学科。其中经典之作用尤其重要,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学生大量阅读经典,涵养悠游其中,久久为功,必能提升人文与专业素养,还能陶冶心灵,改变气质。我们每一次重读经典,就是一次新发现的航行。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强调通过与经典的对话真正认识自己。“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今人也只能与古代的那些伟大心灵在其智慧的结晶——经典著作中相遇。经典阅读能让我们在身心解放中拓展视野,犹如心灵的探险与灵魂的壮游。传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止于至善”的个人道德境界,许多文学经典致力于颂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对复杂多样的人性原态有更深刻的揭示,这些都能让人从中发现真实的自己,从而疏浚心源,检点自我,养成反省习惯,然后从心灵深处生出博大的人文与社会关怀,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屈原的“美政”,李白的“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政治理想,无不让人激发起这种关怀与担当!

阅读经典又是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熏陶的重要渠道。大凡称得上经典的文学名著,多是出自那个时代的语言和思想非常成熟的大家之手,这些名著主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文学名著的价值,多在于历史认识和审美意义方面。而学术经典的意义,则在于曾经的学术研究的高度与方法的创新,它在人类文化与学术史上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后人既难以绕行,又能从中得到启迪与指引,可以少走弯路,而事半功倍,攀登新的学术高峰。

如果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更能找到阅读经典之于专业成长、治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意义。传统中国学术极重视校讎学亦即文献目录学,文献目录学乃最重要之治学门径与方法,“辨章学术”必待“考镜源流”^①。张之洞曾告知其门生,“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②,传统国学不正是强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治学必读之经典与圭臬吗?

①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义通解》之《章学诚自序》:“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张之洞:《輶轩语》,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27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湖北省高校首批省级品牌专业和教育部特色专业立项建设点，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专业及课程建设。文学院给本科生开设文史经典导读的教学创新与实践，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后来为落实教育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和推进转型与内涵建设，我们编印了《文学院本科生专业学习手册》，其主要内容是由我院专家教授列举的230多种必读书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均为各专业与学科公认的经典要籍）和专业期刊、必背500首经典诗词，并要求学生四年内完成100篇读书报告与文章的写作（简称为“三百工程”）。新生一进校，人手一册，让同学明确专业培养目标与基础性专业要求。这两项措施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实践，效果非常显著，成为我院教学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学生和包括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多项评估与考察的专家的充分肯定，也坚定了我们继续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决心。因为十多年前出版的《经典名著导读》印数甚少，导读的经典数量上也只十余部，兼之导读之师资有较大变动，完全不适应教学之需要，遂有此部全新的《中外文史经典导读》面世。

本书精选26部中外文史经典要籍，由文学院25位老师进行导读，目的是为刚刚进入大学的文史类大学生提供快捷的学习与研究的引导，使其尽快进入专业状态。体例上充分考虑到大一同学的实际，主要由作者介绍、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成就与影响、研究现状和参考文献等板块构成。导读不仅梳理经典之框架结构，揭示其核心要义，还探析文学或学术渊源、历史文化背景，剖析作者之心态，重在引领入门，使同学们迅速掌握经典的主要内容和精髓，导读重在要而不繁，精炼适当。在帮助同学们准确理解经典原著的同时，也有导读老师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的简介，既展示各位导师的学术专长，也可以培育学生的学术兴趣，使他们掌握初步的研究方法，了解治学门径，为日后专业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当然，我们要强调的是“导读”绝不能代替对经典要籍原著的阅读，老师的“导读”只是介绍与引领，真正掌握经典，必待对原著认真细致的阅读、甚至是反复的探讨与钻研。另外，阅读还需结合相关内容或问题进行拓展阅读，也就是相关要籍的延伸阅读，碰到文字、典故等还需要查阅相关工具书，并且要坚持做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这样才能真正学有所获、学有进步！这也是我们开设经典导读课程和编著此部《导读》的初心。

感谢李宏校长、王赛玉副校长对文学院专业建设与改革的悉心指导和支持！感谢文学院诸位专攻术业、辛勤从教的同仁！感谢认真负责的杨洁女士！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吴珉、王铭、陈荐宇、孙佳妮同学参与了本书文字校对和体例的修改，谢谢她们！

景遐东

2018年仲夏于湖北师大青山湖畔

目 录

《诗经》导读.....	徐柏青 (1)
《庄子》导读.....	黄燕妮 (18)
《楚辞》导读.....	刘桂华 (30)
司马迁《史记》导读	舒大清 (45)
刘义庆《世说新语》导读	景遐东 (54)
王实甫《西厢记》导读	石 麟 (77)
汤显祖《牡丹亭》导读	石 麟 (93)
吴承恩《西游记》导读	吴福秀 (109)
曹雪芹《红楼梦》导读	胡淑芳 (125)
孙洙《唐诗三百首》导读	曾羽霞 (138)
鲁迅《呐喊》导读	杨文军 (149)
巴金《寒夜》导读	晏 亮 (167)
赵树理《三里湾》导读	王再兴 (181)
巴尔扎克《高老头》导读	彭江浩 (195)
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导读	文彬彬 (210)
钟嵘《诗品》导读	李有光 (224)
刘勰《文心雕龙》导读	王 成 (24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导读	王守雪 (253)
亚里士多德《诗学》导读	谢龙新 (269)
马建忠《马氏文通》导读	车录彬 (280)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导读	马芝兰 (292)
朱德熙《语法讲义》导读	张道俊 (303)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导读	黄 芳 (313)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导读	赵爱武 (32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导读	李治平 (333)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导读	贺义廉 (347)

《诗经》导读

徐柏青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作品305首，按照音乐类别分为《风》《雅》《颂》3大类。《风》，又称《国风》，是从当时15个国家和地区采集来的民间诗歌，编成15个部分，称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有作品160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2个部分，有作品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3个部分，有作品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在先秦时期，《诗经》通称为《诗》，这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记载。称《诗》为《诗经》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这是因为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订的几部书籍，即《诗》《书》《礼》《易》《春秋》“法定”为经典，并且设置“五经博士”，从此，先秦时期的所谓《诗》就被称为《诗经》。

自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教授生徒以来，历代读书人都要诵读《诗经》，至今已有2500多年。但是，在这2500多年中，人们对诵读和研究《诗经》，其价值取向却有很大不同。先秦时代，人们读《诗经》主要是注重其政治实践价值、在外交场合中的语用价值以及个人思想修养和能力的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从此以后，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人们诵读《诗经》，所注重的主要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诗经》不仅仅是周代文学的光辉结晶，而且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文化，它既是周代的文学经典，也是周代的文化宝典。因此，我们这里对于《诗经》的导读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即《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文化。

一、《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与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所谓政治讽喻诗，亦称政治怨刺诗或政治讽刺诗，是指《诗经》中那些以关

注国家命运和政治得失为主要内容并具有讽刺和劝喻意义及哀怨情感的诗篇。这些诗篇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之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诗经》中《大雅》和《小雅》所收录的政治讽喻诗共 53 首,其中《大雅》7 首,《小雅》46 首。《大雅》中的 7 首,其讽刺对象主要是周厉王和周幽王。其中讽刺周厉王的有 5 首:《民劳》《板》《荡》《抑》《桑柔》;讽刺周幽王的有 2 首:《瞻印》《召旻》。《小雅》中的 46 首,其讽刺对象比较宽泛,有讽刺周宣王的,有讽刺周幽王的,有讽刺周幽王之时的,也还有其他的讽刺对象,但以讽刺周幽王的作品最多。具体作品如下:讽刺周宣王的有《祈父》《白驹》等 4 首;讽刺周幽王的有《节南山》《正月》等 35 首,讽刺周幽王之时的有《宾之初筵》等 3 首。

政治讽喻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讽喻诗,其内容虽然主要是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讽刺朝政的腐败,哀叹个人和民生的不幸,但同时也深刻地表达出诗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的忧患文学。《诗经》中政治讽喻诗作者的忧患意识主要产生于“国步斯频”的严重社会危机之中。

根据《毛诗序》的说法,《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我们知道,周厉王姬胡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虐之君。在他统治期间,“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大雅·桑柔》)并且用杀人的办法来消除人民对他的不满(见《国语·周语》)。周幽王是继厉王之后的又一个专横暴戾、骄纵荒淫的昏君。他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的虢石父为卿,把持朝政,又宠幸褒姒,败坏朝纲,使得天灾人祸不断,国无宁日,民不堪命,怨声载道,结果导致西周王朝的灭亡。《诗经》中政治讽喻诗的作者,大都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当然,《诗经》中政治讽喻诗的作者是谁?我们现在很难考证清楚。因为这些诗篇仅有少数几篇透露出作者的名姓,绝大多数诗篇没有作者的任何信息。即使有的诗篇透露出作者的名姓,但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现在也无法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尽管如此,但从这些诗篇的语气,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测其作者应是一批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虽然他们的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之别,但他们却有一些共同特点:绝大多数身为王臣,处在政治漩涡之中,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感受重心在王朝政治,情之所衷、情之所由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君臣、臣臣关系及其对自身的波及和影响;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正是由于有这些共同特点,所以《诗经》中政治讽喻诗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也就特别强烈。仅从诗歌的文字表达上看,不仅表现忧患的诗句特别多,而且“忧”字也出现得特别频繁,如“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忧心

慙慙，念我土宇。”（《大雅·桑柔》）“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等，真可谓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痛心疾首，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忧与痛，愁与苦。

综观《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其表现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即使是个人的忧生之嗟，也可以说是政治黑暗，朝政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结果，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这在《小雅》中的《小宛》《小弁》《巧言》《巷伯》《北山》《何草不黄》等诗篇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这些诗篇，按照《毛诗序》的说法都产生于周幽王时代，并表现出相同的主题，即作者自身处境艰难，遭受生存危机。如“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宛》）的深沉悲叹，“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的沉痛哀伤，“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幪”（《巧言》）的痛彻心扉的呼喊，“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巷伯》）的呼天抢地的悲鸣，“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北山》）的痛苦陈述，等等，虽然表达的都是个人的忧生之嗟，但诗人这种忧生之嗟正是由于当时政治的黑暗，朝政的腐败，社会的动乱造成的，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所以《毛诗序》将这些诗统称为“刺幽王也”。

在《诗经》的政治讽喻诗中，那些忧虑国计民生，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感的作品，无疑是《诗经》的精华。它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的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注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

如《大雅·荡》，《毛诗序》云：“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诗歌开篇写道：“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的所谓“上帝”实指周厉王，诗歌开篇就直斥君王暴虐，说他骄纵又放荡，贪心又暴虐，政令邪僻无信。接下来，作者又借文王斥责商纣王的口气，逐层揭露厉王的罪过，总括起来就是：暴敛如狂，恣行无忌；迫害贤人，构祸朝中；敛怨为德，善恶不明；沉湎于酒，狂乱可憎；怙恶不改，朝政纷乱；废弃典刑，大命以倾；剥丧本根，国将不国。由于厉王的专制，以致民怨四起，如蝉之鸣，如羹之沸，无时能静，无地能清。在国家濒于灭亡之际，作者忧心烈烈，大胆向厉王敲响了警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作者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

许多《诗经》政治讽喻诗不仅表现了作者身处国破世危的险恶环境中，“忧心殷殷”“鼠思泣血”，而且更表现出他们欲挽狂澜于既倒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如《小雅·十月之交》，《国语·周语》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这首诗大约就写于这个时期。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全诗让人感到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开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精神之先河。

士人关心国家政事，具有悠久的传统，完全可以说周代的历史是伴随士人们的积极介入而发展的。他们的积极干预意识、忧患意识，形成周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这种品格和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诗经》中政治讽喻诗不仅影响了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而且也影响了后世屈原、贾谊、岳飞、林则徐、谭嗣同等历代士人。探讨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对后世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想到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为家”（《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秋瑾的“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柬某君》），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

二、《诗经》中的史诗与周部族的历史

史诗，顾名思义，就是以诗叙史。马克思曾根据希腊史诗的各种类型归纳出形成史诗的三个基本要素：歌谣、传说和神话，史诗是这三要素的综合。《诗经》中有没有史诗？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学者认为，《诗经》中虽然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大型史诗，却有小型史诗或微型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就是这种小型史诗。

从内容上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诗，主要是叙述周人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比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如《生民》主要叙述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的神奇和对农业的发明。全诗共八章，每一章的叙述，都突出地表现了神异的色彩，这正是一般史诗所具有的特色。首先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而受孕并生下后稷；继而叙述后稷被弃而不死及其健康成长；接着叙述后稷在农业上的发明创造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最后叙述后稷率领族人举行大祭以及“后稷肇祀”之后，全族人民对后稷事业的继承。可以说，这是一首典型的史诗。它既叙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神奇诞生及其成长，也叙述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发明和创造。在叙述中，不仅反映出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轨迹，而且也反映出周部族的成长和发展，并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民族在农业上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后稷不仅是周民族的始祖，而且也是一位创造农业文明的文化英雄。

后稷之后，周部族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祖先——公刘。《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所谓“诗人歌乐思其德”而产生的诗歌作品就是《公刘》。《公刘》主要叙述了公刘率领部族迁往豳地并营造新邑的历史。全诗六章，围绕不肯苟安、开拓奋进、率部迁徙、营造新邑的主线次第展开。虽然颂歌意味颇浓，但整个诗篇却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完整地勾勒出了周部族由邠到豳的迁徙过程，以及到豳地后勘察测量、规划开发、营建宫室的情景。可以说，周部族举族自邠迁豳，并在豳地规划开发，营建宫室，是周族开始兴盛的重要标志。

自公刘之后，经九世而传至古公亶父。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继立后，“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但时时遭戎狄侵扰。于是他率周族“度漆沮，逾梁山”，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建立国家机构。以后周族就在这里逐步强大起来，至文王时，其力量则可与殷商相抗衡。《绵》这首诗就叙述了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岐、建国、创业的过程。诗分九章，前七章叙古公亶父事，后二章言文王事。《诗序》说：“《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这正说明了诗人构思的指导思想。诗歌对古公亶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率周人迁岐并亲自考察地势，二是营建宫室居邑。营建宫室居邑对周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预示着新生活的来临，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型国家的诞生。因此，诗人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营造新居的建筑工程。在叙述中，诗人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记叙：先察看地形，进行谋划，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特别是对建筑场面的描写，可谓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生动地表现出周人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因而这首诗也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古公亶父开辟岐山后，其子季历“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使周部族的事业继续发展。及至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使周部族事业蒸蒸日上。同时又不断扩充疆土，接连取得了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邶，伐崇侯虎等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古公亶父创下的基业，成为可与殷商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十一年后乃誓师牧野，伐纣灭商而成为天下共主（参见《史记·周本纪》）。在《诗经》中，叙述这一历史功绩的作品，主要是《皇矣》和《大明》这两首诗。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从《生民》到《大明》五篇史诗，的确是较为

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人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读了这些诗，仿佛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在遥远的古代，在黄河之滨，西北黄土高原上，居住着一个非常勤劳智慧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开拓者，他们在一再迁徙中，勤苦地劳动着，把一片片荒凉的山丘原野，改变成可以获得丰稔收成的国土。他们在那里，最初是掏穴而居，后来又营建都城、宫室，战胜和统一了周围的部落，建立了有广阔国土、高度文化的强大国家。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周人祖先的艰苦生活环境，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奋斗、创功立业的伟大精神。我们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所以《诗经》里仅存的这几篇古老的诗篇，是非常珍贵的。

三、《诗经》中的宴饮诗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所谓宴饮诗，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以及在宴会上所奏的乐歌。《诗经》中的宴饮诗，主要见于《小雅》。根据《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主要有《鹿鸣》《常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等作品。另外《大雅》中的《行苇》也属于这类诗作。这些宴饮诗，虽然其产生的背景各有不同，所写的内容各自有异，但它们都与周代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礼”，即“周礼”。现存儒家的礼制经典有三部，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这三部礼制经典，虽然都与周礼有关，但在先秦时期，《周礼》称为《周官》，《礼记》尚未成书，因此，先秦时期的所谓“周礼”，实际上是《仪礼》，当时称之为《礼》，后人则称之为《礼经》。《礼》所记载的主要是各级贵族在冠昏（婚）、祭祀、丧葬、朝聘、宴射、军旅等典礼中“登降揖让进退酬酢”程序以及衣着陈设等的礼仪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谓“乐”，即音乐，是“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谐融洽，异中求同，缓和矛盾。其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在陶冶人的性情中达到移风易俗，以利于“礼”的贯彻执行。正因为《礼》所记载的主要是礼仪制度，而《礼》的运用又常常借助于音乐，所以在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礼”和“仪”、“礼”和“乐”二字连用。如《诗·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礼仪既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也。”《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综观《诗经》，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诗歌作品就是周代礼仪制度的具体体现，或者说，周代的种种礼仪制度，决定了《诗经》中许多作品的基本内容。例如《周颂》，其中绝大多数诗篇都与祭祀礼有关；而在《国风》《大雅》和《小雅》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作品与射礼、婚礼关系密切，特别是其中的宴饮诗更是与周代的礼乐文化关系紧密。

宴饮诗之所以与周代的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宴饮与“礼”

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礼的起源与饮食密不可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其次，在举行各种礼时都离不开宴饮。无论是婚冠丧祭，还是朝聘会同，或为了隆重，或为了虔诚，或为了真诚，或为了尽欢，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各种宴饮，所谓“礼终而宴”，正是说宴饮是各种礼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最后，礼乐精神在宴饮中比在其他一般场合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宴饮中，尊卑贵贱，长幼之序可以得到突出的反映，而这正是礼的重要内容。又如在乡饮酒礼和飨礼中，如何“谋宾”，如何“迎宾”，“献宾”时如何“献”“酢”“酬”，以及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进退容止，都有十分详尽而具体的要求。

宴饮与礼乐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宴饮诗的性质及其与礼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了宴饮诗比《诗经》中其他各类诗歌更能全面而突出地反映出礼乐文化精神的风貌。

作为文学作品，宴饮诗所写的宴饮当然是经过概括和提炼的，虽然已不同于生活中的原型，但由于这类诗歌常常采用直抒其情、直写其事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它与礼乐文化精神的某些对应点，如《小雅·鹿鸣》。《毛诗序》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高亨先生说：“周代国君宴会群臣和宾客，要奏乐为娱，所以特撰《鹿鸣》诗，以备歌唱。”（《诗经今注》）虽然这首诗是“宴会群臣和嘉宾”时所唱的歌，但从中表现出的礼乐文化精神却是十分鲜明的。

其次，它向我们展示了礼乐文化的外在形态。如诗中所写：“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这说明，举行宴会，既要“鼓瑟吹笙”，以音乐娱乐宾客，又要“承筐是将”，以礼品献给嘉宾，还要准备美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在这方面，《大雅》中的《行苇》，《小雅》中的《彤弓》《瓠叶》所展示的礼乐文化形态，更是与《仪礼》和《礼记》所记叙的礼仪大体相同。如《大雅·行苇》，朱熹《诗集传》曰：“此疑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其中所写的“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以及“敦弓既坚，四鍤既钧。含矢既均，序宾以贤”诸程序正与《仪礼·乡射》和《礼记·射仪》所记大体一致。区别仅仅在于《仪礼》和《礼记》所记繁杂琐细，《诗经》所写则画龙点睛。又如《小雅·彤弓》，是“天子燕有功诸侯，而赐以弓矢之乐歌。”（《诗集传》）其中所谓“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钟鼓既设，一朝醕之。”则正是古代饮酒礼的写照——“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饮，而遂酌以饮宾，谓之醕。”（《诗集传》）而《小雅·瓠叶》“亦燕饮之诗。”（《诗集传》）其中对饮酒礼写得更加具体：“君子有酒，酌言

献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这里所写的“献”“酢”“醕”，亦即乡饮酒礼中“献宾之礼”的重要内容。诗中所写的宴饮之礼，与《仪礼》所记宴饮一样，所突出的都不是个人行止的随意性，而是各安其位的等级秩序和宾主之间的揖让节文。这充分说明，《诗经》中的宴饮诗写宴饮的程序和仪式，是严格按照礼的要求和规范的，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妄加改动。

再次，突出了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如前所述，《小雅·鹿鸣》本为宴群臣嘉宾而作，表现出按礼待宾的殷勤厚意。但其中却特别写出了对于德的向往和赞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反映了好礼从善，以德相勉的社会习俗。这正是周人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知道，周人重礼又重德，正如王国维所说：“周之制度典章，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章，乃道德之器械”（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因此，在周人看来，礼和德是一致的：德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礼体现着德，德规定着礼，一个人守礼即有德，有德必守礼。这种把德与礼相统一，把宴礼与人的道德风范联系起来，在宴饮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可以说是《诗经》宴饮诗极力宣扬的内容。不仅《小雅·鹿鸣》如此，其他宴饮诗也大都如此，如《小雅·湛露》。按照朱熹的说法，这是一首“天子燕诸侯之诗”（《诗集传》）。在诗歌中，诗人虽然说“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但是，更强调要有诚信及和易近人的君子之风，更突出地赞美了“令德”“令仪”，即品德涵养、容止风度之美。再如《大雅·行苇》写祭毕宴父兄耆老和竞射，从诗中洋溢着的和乐安详气氛，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谦恭诚敬之德的肯定。又如《小雅·伐木》是一首“燕朋友故旧之乐歌”（《诗集传》），诗歌虽然描写了酒肴的丰盛，表达出邀请朋友故旧的诚挚热情，但正如诗歌的第一章所说，宴会朋友故旧的目的，并非为了大吃大喝，而是为了求得朋友，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友爱，而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一主题，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彤弓》以及《瓠叶》等诗中同样表现得十分鲜明。这些诗篇，或写酒肴丰盛，或写款待盛情，其意同样不在酒肴和酬酢本身，而在表现宾主关系和谐以及气氛的融洽，其根本着眼点还在于德。可见这些宴饮诗所歌颂的不仅是宴礼的外在的节文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道德风范，是好礼从善的能动欲求。

此外，《小雅·宾之初筵》是一首颇值得我们重视的宴饮诗。此诗据说是“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诗集传》）无论此说是否正确，但其中却明显地表现出戒耽酒而扬酒德的写作目的。诗歌在向我们展示古代宴会的热闹场面和待宾之礼的同时，主要是用对比的手法讽刺了酒宴中饮酒无度而失礼败德的行为。戒耽酒，是西周初年就已确定的政治教训，周公曾告诫周成王：“无若殷王（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尚书·无逸》认为殷纣之所以有杀身亡国之祸，正是纵酒无度所致。因此，在周人心目中，狂饮纵酒和以酒宴宾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故诗人强调“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喝酒并不是坏事，只是要遵守礼仪，保持良好的道德风貌。因而诗人认为必须加强监管：“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古代宴会上专门设立有“酒监”和“酒史”。“酒监”是纠察的官吏；“酒史”是记事的史官，“宴会中有史，以备记酒醉胡闹的故事。”（高亨《诗经今注》）诗人所谓“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正是据此而生发的议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戒耽酒而弘扬宴饮中的“令德”和“令仪”，从而维护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

四、《诗经》中的祭祀诗与周人的宗教观念

所谓祭祀诗，是指那些在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祖先、祈福禳灾的诗歌。在《诗经》中，这类诗歌，主要见于《颂》。《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诗集传》曰：“颂者，宗庙之乐歌。”郑樵《通志序》曰：“宗庙之音曰颂。”陈奂《诗毛氏传疏》曰：“颂者，皆祭祀之诗。作于成功之后而其事或涉于成功之先。”如前所述，《诗经》中的《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有作品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我们这里所说的《诗经》中的祭祀诗，是指《周颂》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些作品，既与周代的祭祀礼有关，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同时这种独特的题材内容又具有鲜明的思想特征和丰富的宗教文化价值。

《诗经·周颂》中的祭祀诗，根据《毛诗序》、朱熹《诗集传》、陈奂《诗毛氏传疏》以及姚际恒《诗经通论》等的说法，共有27首，其中除《丝衣》不知所祀何神外，其他26首均有明确的祭祀对象。这些祭祀对象实际上可以分为四类：上帝、社稷、山河、祖先。在四类祭祀诗中，祭祀祖先的诗歌最多，共有20首；而在这20首祭祀祖先的诗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诗歌最多。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认识：《诗经》中祭祀诗数量如此之多，这足以说明祭祀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祭祀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周人对祭祀的高度重视，而且通过这些祭祀诗的祭祀对象，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的宗教观念，其主要内容就是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祖先崇拜，是周人宗教观念的重要内容，根据《毛诗序》、朱熹《诗集传》等的说法，《周颂》中祭祀祖先的诗歌有20首。祖先崇拜实际上与宗法制社会密切相关。周王朝是以姬姓为首的周部族推翻商王朝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是以子姓为首的商部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他们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同时也是两个不同种姓部族之间的斗争。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周王朝不仅大封同姓诸侯，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度。“自西周以来，天子是共主，同时也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诸侯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同族卿大夫的大宗。可以这样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关系，都是用宗法制度来维系着的，他们之间的关